

|||

东北亚研究

|||

西北史地研究

|||

李之勤 著

中州古籍出版社

PDG

《东亚文库》编委会

主 编 孙进己
副 主 编 黄凤岐 冯永谦 干志耿 苏天钧
李昌仁 朝 鲁 刘永智 穆鸿利
常务副主编 冯永谦
编 委 (按姓氏笔划为序)
干志耿 于国华 王宏刚 王革生 王绵厚 王 雷
刘永智 卢明辉 冯永谦 冯继昌 冯继钦 孙秀仁
孙 泓 孙 海 孙进己 齐 心 朱国忱 吴文衍
苏天钧 李之勤 李昌仁 李英魁 李逸友 李殿福
张志立 张泰湘 高书全 孟广耀 周伟洲 崔 灿
郑绍宗 黄凤岐 朝 鲁 秦洪祥 蒋秀松 魏国忠
魏福祥 穆鸿利 潘喜廷
编辑部主任 孙 海
编 辑 孙 泓 张志立 张玉虹 张 岩

《东北亚研究》编委会

主 编 孙进己
副 主 编 冯永谦 黄凤岐
编 委 (按姓氏笔划为序)
干志耿 冯永谦 卢明辉 刘永智 乔成果 孙进己
刘远图 李之勤 苏天钧 李殿福 金 岳 孟广耀
朴成昊 周伟洲 郑绍宗 张声振 张泰湘 郭洪茂
秦洪祥 高书全 崔 灿 黄凤岐 蒋秀松 潘喜廷
魏国忠

《东北亚研究》总序

东北亚目前包括六个国家和地区：蒙古、朝鲜、韩国、日本及俄罗斯的远东、西伯利亚地区和中国东部和北部地区。在这些国家和地区中，中国东北地区占有重要地位。因为它正处于东北亚各国的中心位置，它东和北邻俄罗斯，西邻蒙古，南接朝鲜，隔海与韩国、日本相望。由于它的地理位置，它自然地应该成为东北亚各国交往的枢纽。在历史上，中国也曾起过这样的作用。汉唐以来，中国长期是东北亚经济文化最先进的国家，东北亚各国间的交流长期是以中国为中心，呈幅射状态。长期以来，中国的经济文化积极影响着东北亚各族经济、文化的发展。当时中国也是对东北亚各国各地区最为了解的国家。当时中国有关东北亚各国各地区的记载，至今还是研究这些地区的重要史料，其价值甚至超过他们本国的史料。

近代以来，中国经济、文化的发展落后了，东北亚一些国家和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超过了我们。这些年来，反过来是这些国家和地区影响着我国经济、文化的发展，与此同时，我们对东北亚各国各地区的了解也落后了。有一段时间，不仅我们对东北亚其他国家和地区的了解、研究落后于他们本国，甚至我们对自身的了解、研究也落后于东北亚某些国家。这种落后与我们长期的闭关自守是分不开的。

随着改革开放的发展，中国又再次加强了和东北亚各国的经济文化交流。但是中国在东北亚应有的地位还未完全恢复。我们并不想恢复中国在汉唐时对东北亚的统治地位，我们只指望和东北亚各国建立平等互利的交往，在东北亚事务中发挥应有的作用。

但要做到这些，一方面必须促进我国经济文化的发展，迎头赶上东北亚的先进国家和地区；一方面必须加强对东北亚各国的了解和研究，这两者又是互相联系的。只有促进我国经济、文化的发展，才能为我们更多了解东北亚各国奠定物质基础。也只有加强了对东北亚各国的了解和研究，才能更好向各国学

习,以促进我国经济文化的发展。也只有加强对东北亚各国的了解和研究,才能知己知彼,更好地和东北亚各国联系交往。

长期以来,学术界有一种认识,总认为我们在研究东北亚各国时必然落后于他们本国,我们拿不出什么有价值的成果。但是对任何问题的看法,都有一定的立场观点,各国各自有不同的立场观点。今天中国在东北亚事务中日益起着更重要的作用。这就要求中国人站在自己的立场观点来重新认识东北亚的历史和现实,而不是照搬别人的观点,东北亚各国也有必要认真了解研究中国人对东北亚问题的立场观点。没有彼此间新的认识为基础,要建立东北亚和中国的新的关系是很困难的。

因此,我们早就决心加强对东北亚各国政治、经济、文化的历史和现状的研究,决心把我国东北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放在东北亚各国总的发展中来重新认识,决心研究我们在历史上和东北亚各国的交往和所起的作用,并进而研究我们和东北亚各国的关系及应承担的责任。

我们决心系统整理总结我国学者对东北亚的研究成果。弄清我们对东北亚究竟知道多少,不知道多少;过去哪些看法是正确的,哪些看法是需要改进的。也要让国外学者知道中国人对东北亚各方面问题有我们的立场观点,必须了解和尊重我们的观点,我们不会再让别人歪曲和篡改历史,任意摆布我们。我们要用我们的学术成果让大家知道,我们已准备好和各国学者在学术上交流与争鸣。这就是我们编这套书的宗旨。

我们力求在本书中全面反映我国学者对东北亚各国政治、经济、文化的历史和现状的观点,但由于编者的水平有限和一些客观上的困难,可能一时还实现不了我们的想法,但我们有决心再接再厉,最终一定实现我们的宗旨。

孙进己

一九九四年十二月



作者近照

李之勤，山东菏泽人，生于1923年。1945年入西北大学历史系。1952年入北京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历史考古教研室研究生班进修。师从尚钺、郑昌淦、戴逸等先生。从1974年开始，先后担任西北大学西北历史研究室副主任、主任，副教授、教授。1988年兼任陕西师范大学和西北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副所长、西北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所长。1990年退休。退休前曾任中国古都学会、中国唐史学会、西北地区中俄关系史研究会、陕西省历史学会理事，中国地方志协会、陕西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委员，西安历史地理学会副会长，蜀道和褒斜石门学会名誉会长等。先后发表论文一百余篇、专著多部。

前言

从学生时代,我就喜欢历史和地理,爱读名人故事,远方游记。课余游戏,常与同学比赛查找地图上的小地名以为乐。但由于生长在山东、河南、河北交界处的华北大平原上,活动范围不出县城 50 里,既没有登过一座真正的石山,也没有见过一条常年流水的河。抗战军兴,家乡沦陷,流亡四方。到安徽肥河口,得生平第一次乘船航行。当接近日伪控制的平汉铁路附近,始得远望西方群山,为画为屏。为之欢欣鼓舞,情不能已。其后徒步跋涉于河南、湖北、陕西群山和汉水峡谷之中,虽经风吹日晒,上雨下泥,饥疲交迫,而兴致不减。战时中学,连课本都没有,更说不上课外书刊,日寇投降,入尚在陕南城固的西北大学历史系。冉昭德、林冠一诸老师、谊属同乡,多方关照。涉猎稍多,眼界渐开。除往访陕南古迹名胜汉王城、霸王城、张骞墓、樊哙台、武侯祠,登斗山、天台山、定军山之外,又趁迁校西安之便,拟取子午道翻越秦岭北来,旋虑沿路不靖,又恐夏雨阻途,乃改循汉中宝鸡公路,也就是元明清时代的连云栈道步行。十日之中,盘桓于褒城、留城、凤州诸古城、草梁、马道诸古驿、双石、黄牛古东河桥诸铺,大散、武休、废邱诸古关,以及传为萧何追韩信的寒溪,樊哙明修栈道的马道,汉高祖刘邦北伐三秦所经的酒奠梁、煎茶坪、张良避谷修行的庙台子,雄踞双石铺尖山之顶的关帝庙等诸多历史古迹、名胜险隘。美中不足的是,汉魏褒斜石门、石刻以及滚雪、玉盆诸胜,远在对岸或江中,无船可渡,只能沿新石门一侧隔江远眺;传说中韩信问道斩樵夫的陈仓古道,指路无人,不敢深入,近在咫尺的樵夫墓失之交臂;而连云栈道上的奇险胜境的凤岭,也因已不沿公路路线而未得登临。到西安后,幸得史念海老师教诲,对历史地理的兴趣倍增。但治学之道,并未入门。学生时代,或激于洋人之诬蔑,或由于个人之兴趣,或由于师长之启发,或迫于学校之规定,也曾舞文弄墨,搜集我国古代记载日蚀的资料,探求长安引水入城的遗迹,撰写《南朝世家大族之陵替》及《南北朝交聘考》等文稿。既不知学术研究应在前人基础上求其进展,徒贸然撷拾大路旁一般资料,自难有成。故毕业以前,习作之得登于西安报刊者,仅《北魏桂国大将军考》一篇而已。西安解放,留系任助教,即投身政治学习,思想改造,土地改革三反五反诸运动,并参与中国近现代史教学。亦偏爱其地理、地图方面,闭门造车,思有表现。1952 年被保送北京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历史研究生班进修,在尚钺、郑昌淦、戴逸诸老师指导下,系统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跻身中国明清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讨论,先后写成文稿四篇,而一篇因编辑部误书地址于邮递中遗失。1955 年毕业回系,担任中国历史文选和中国古代史教学。前者有助于古汉语水平的提高,为其后参加《汉书》标点、选注《汉书》、搜集整理、杜佑、王

微、唐甄遗著和资料,校点《三省边防备览》以及《新疆国界志》、《新疆交涉志》等工作准备了条件。中国古代史教学最初只分担明清部分。后来范围逐渐扩展,由宋辽金元以至隋唐。再加僻处西北,资料欠缺,关于明清经济问题的研究,被迫中断。只得随教学内容变化,就所遇到的问题,作应急性的探讨。这便是收入本集的中国古代史文章极为散杂而缺乏系统的主要原因。而个人的偏爱,仍在历史地理方面。讲课中尤注意于历代疆域伸缩、政区沿革、交通水利设施,经济军事形势以及攻守策略、行军作战路线和有关地图的绘制。由于工作地点在西安,所以对陕西和西安的历史,为杜佑、王微的研究也有所关心。文化革命开始,教学科研俱停,却得以学习伟大领袖革命实践的名义,南游韶山、井冈山和北上延安,先后徒步瞻仰瓦窑堡、青阳岔、王家湾、小河等地的毛主席故居,察看黄土高原路在山上人居洞中的特殊地貌,领略长城高耸黄沙漫漫的边塞风光,体验革命老区环境的艰苦和人民生活的困难。70年代初,被借调去陕西省军区编写《陕西兵要地志》和《陕西军事历史地理资料》,在史老师领导下负责古代政区、通道、关隘、战地和战例的资料收集和部分编写任务,又得前往平时难得前往的诸多军事要地进行实地考察的机会,加深了对有关文献以及战争成败与地理条件相互关系的理解,提高了研究能力,增加了对历史地理研究的热爱。1973年,由于在中苏关系紧张期间曾对沙俄侵华问题有所关心,又被调入西北大学与新疆、甘肃有关院校和科研单位组织的编写组,编写《沙俄侵略中国西北边疆史》,负责边界条约、边界变迁和地图绘制,并参与总体规划和统稿工作。由于当时认为这是一项重要政治任务,所以自己能力虽差而积极性高,责任心强。一山一水,一字一句,徇名责实,反复推敲,追根究源,锲而不舍。坚持摆事实,讲道理,不作夸张之论,不用污蔑之词,务期不给对方留把柄,力争不持偏见的第三者的认可与同情。成果不多,心力已尽。可惜有关方面过分强调进度,致使执笔者未得带着问题去现场实地调查,而前往考察者又因未从事编写而在考察中考虑难周。从工作说不能说不影响质量,就个人说亦难免留有遗憾。80年代以来,情况大变。在转向以西安为中心的古驿道交通研究中,吸取了陕西军事地理研究和中俄边界变迁研究中的经验教训,特别重视在整理有关历史文献,发现疑难问题的基础上,进行有目的的实地考察。10多年来,通过参加有关地区的文物普查和中国唐史学会、褒斜石门研究会和陕西省交通厅、西安市交通局等单位组织的古道考察,历史上曾被辟为驿道的故道、褒斜、傥骆、子午、金牛和蓝溪、丹水诸谷道的大部分路线,皆得亲履。对这些古驿道的位置、走向及其发展变化的过程,也有了比较具体的了解。从而使有关历史记载中的某些缺漏得以弥补,某些抵牾得以澄清,某些讹误得以校正。在研究、考察过程中,又有幸陆续拜读严耕望先生六七十年代在香港和台湾发表的有关唐代驿道交通的部分论文,严先生知识渊博,治学严谨,其关于唐代交通的研究,体大思精,论证详审,可谓前无古人,读后深受教益。但智者千虑,或有一失。由于客观条件(如历史记载既多疏略抵牾,又不能亲身进行实地调查,且无大比例尺地形图以供参考)的限制,论断亦间有可议之处。遇有可能,我也都不付冒昧,尽量提出自己的意见。已写文稿20余篇,亟待探讨的问题自多。不幸内人突患脑溢血,后遗半身不遂。语言有障碍,视力零点一。吃药、吃饭、穿衣、结带均需帮助。她既无工资收入,又不得享受公费、半公费医疗,我退休在家照顾,不能离身,还需挤时间做些有偿服务,以充她的医药费用。勉力支持,已逾三年。野外考察既无条件参加,图书馆、资料室亦多日难得一去。学业方面估计今后也不会有多少进益了。如何将过去文稿整理出版,以供参考而免散失,自然不能不是脑海中时常萦回的问题。而当前现实又警告我

最好丢掉幻想。因为，前在军区编写的《陕西古近代重要战争评述》，十三四年前即被省内规模最大、资格最老的出版社接受，几度迁延之后，近日却以一纸八行，无条件退稿，理由是“图书出版，每况逾下。”又为，被列入省古籍整理第一批计划书目的《三省边防备览》，也因出版补助问题，已被另专业一出版社压了七八年，还在继续压下去。前者如此，何敢再作冯妇！更何况文化革命以来，著名史学前辈的论文被汇总出版者亦不多见，编辑某一方面文章作为专集出版者虽然稍多，但大都需出版补贴，但就个人情况而论，出版补贴又向何处寻觅！思念及此，结集出版之想自罢。不料春节刚过，伟洲同志来告，东亚研究中心准备组织出版《东北亚研究》，已致函推荐，不日又得编委会同意收录拙文的通知，兴奋奚似！返观前述自己在改革开放大潮中的抱残守缺，踟躇不前，又由于不能适应而牢骚不已，怨天尤人的迂腐形态，何等可笑！不过即系个人一段真实写照，亦不妨存以为谈资也。

李之勤

1993年2月24日

目 录

前言	(1)
第一编 汉魏驿道研究	
一、论古驿道发展的特点和长安在全国驿道网中的地位	(3)
二、历史上的子午道	(9)
三、再论子午道的路线和改线问题	(14)
四、关于褒斜道的名实问题	(29)
五、凤县陈仓沟和韩信北定三秦的路线问题	(38)
六、诸葛亮北出五丈原取道城固小河口说质疑	(44)
七、“故道”释名与考地	(48)
八、既“回远”而又不甚“回远” ——论故道在川陕诸驿道中的特殊地位	(60)
第二编 唐代驿道研究	
一、柳宗元的《馆驿使壁记》与唐代长安城附近的驿道和驿馆	(73)
二、唐代僦骆道上的几个驿馆	(82)
三、僦骆古道的发展特点具体走向和沿途要地	(90)
四、唐敬宗宝历年间裴度重修的斜谷路及其所置驿馆	(103)
五、唐代的文川道	(109)
六、川陕古道中的青泥路和白水路	(119)
七、唐代蓝武道上的七盘岭与韩公堆	(126)
八、蓝田县的两个石门与唐长安附近蓝武道北段的水陆联运问题	(134)
九、论唐代的上津道	(139)
十、唐代河东道驿馆考	(146)
第三编 宋元驿道研究	
一、《析津志·天下站名》校正 ——大都通河南和陕西行省部分	(157)
二、元代陕西行省的驿道和驿站	(167)
三、元代川陕间的驿道和驿馆	(175)

四、《马可·波罗游记》中的 Caigiu 或 Thaigin 究在何地	(181)
第四编 古代航道和桥梁研究	
一、嘉陵江上游古代航运的发展特点	(187)
二、陕西境内古代汉江水运述略	(194)
三、关于元代刘斌兴建灞桥的重要历史文献	
——李庭《寓庵集》的《创建灞石桥记》和路天壤《类编长安志》的《灞桥》条	(199)
四、沙河古桥为汉唐西渭桥说质疑	
——读《西渭桥地望考》	(207)
五、元代重建灞桥的又一重要文献	
——张养浩的《安西府咸宁县创建灞桥记》	(216)
第五编 陕西地方史研究	
一、关于陕西省各县驻地建置镇的命名、更名问题	(225)
二、陕西古代战争评述(二则)	(234)
三、也谈陕西“刀客”的起源	(242)
第六编 陕西经济史研究	
一、西安古代户口数目评议	(253)
二、北宋长安城的商税收入及其在全国主要城市中的地位	
——兼论《文献通考》关于北宋全国重要城市商税收入的统计问题	(260)
三、陕北古代石油二题	(268)
四、陕西植棉史的考察	(273)
第七编 陕西古代人物研究	
一、杜佑的历史进化论	(305)
二、论杜佑《通典》与刘秩《政典》	(316)
三、评郑鹤声著《杜佑年谱》	(321)
四、明末陕西科学家王徵著译考	(325)
五、唐甄事迹丛考	(346)
第八编 中俄边界条约和边疆变迁研究	
一、《中俄北京条约》新疆划界条款的一处标点断句问题	(367)
二、揭批新老沙皇的“常设卡伦划界论”	(370)
三、略论《中俄伊犁条约》关于新疆分界的条款	(381)
四、略论 1882 年的《中俄伊犁界约》	(394)
五、略论《中俄喀什噶尔界约》	(404)
六、论《中俄塔尔巴哈台西南界约》	(409)
七、略论沙克都林扎布的《南疆勘界日记图说》	(417)
八、格登碑、格登山与中俄划界问题	(429)
九、轻易牺牲历史科学的一个实例	
——评古列维奇《哈萨克斯坦和中亚历史的若干问题以及 中华人民共和国刊物对这些问题的歪曲》一文对古代文献的态度	(435)

十、《清光绪九年勘定俄国借地界图》实为同治年间塔城军民在科布多借住地界图……	(439)
十一、新疆作为省(区)名称的由来(西域——西域新疆——新疆) ……………	(444)
十二、论新疆各县的命名、改名等问题……………	(450)
第九编 杂 考	
一、后蜀《利州都督府皇泽寺唐则天皇后武氏新庙记》碑和 广元县皇泽寺的武则天像辨析 ……………	(463)
二、熙宁年间宋辽河东边界交涉研究 ——王安石弃地数百里说质疑 ……………	(468)
三、最早诬蔑王安石弃地的不是邵伯温而是苏辙 ……………	(475)
四、论司马光的曲笔之一 ……………	(480)
五、关于苏联列宁图书馆藏《西夏地图》册手稿的作者和 《西夏地形图》的绘制年代问题 ……………	(488)
六、韩山童、刘福通开始组织元末农民大起义的白鹿庄在何处? ……………	(497)
七、关于《清史稿》的版本 ……………	(504)
作者自传……………	(511)
后记……………	(514)

第 一 编

汉魏驿道研究

一、论古驿道发展的特点和长安在全国驿道网中的地位

驿道是古代陆路交通的主干。虽然民间的物资和人员流动,也有赖于驿道,但其主要作用毕竟是当时的统治者和政府机构为其政治和军事需要,如军政文报的传递、官员使臣的来往、以及部分官物的运送而设置的。

正因古代驿道的主要职能重在政治和军事,所以,它的发展就必然对各该时期的政治和军事势态有很大的依附性。历史上每当一个政权的政治军事力量比较强盛的时期,道路建设和驿道交通就会相应的得到发展;相反,道路建设和驿道交通也就会随之而衰败。由于政治、军事性很强的古代驿道大多是以国家都城为中心,呈放射状通往全国各个主要地区的主要城镇,所以每次政治局势变化,国家都城的位置迁移,也就使全国的交通中心位置发生变更,而且必然会引起全国交通布局、驿道结构发生重大变化。使原来的某些主要驿道,因国都迁移而丧失其重要地位,有的甚至丧失其基本作用;而另一些次要道路的重要性却由于同一原因而提高,并上升为主驿道。

唐代的驿道以长安为中心,分东、西、南、北、东南、东北、西南、西北十余条,穿过关中盆地四周的群山,通向全国各地,其布局可以作为以长安为首都的秦汉隋唐各代驿道体系的代表。其中主要的十条分别是:一、从长安东出潼关去洛阳和汴州的驿道。这条联系东西两京和汴州的驿道,当时称为“大驿路”,其重要性居于全国各驿道之首。从洛阳向东北,大致沿太行山东侧直达幽州以至辽东,向东南,则可达南阳、襄阳以及淮河北联接长江,从汴州向东南则可联系淮南、江南、岭南东南沿海各州。向东北经郢州、青州到山东半岛的登州。二、从长安向东南出蓝田关和武关去襄阳和荆南的驿道。从重要性说,这条驿道的地位仅次于长安、洛阳、汴州线,当时称为“次驿路”。从襄阳和江陵向正南,向东南、西南,水陆并进,可达江南、岭南各地。三、从长安向正南出子午关至金州和四川东部的驿道。四、五、六、从长安向西南,分别出骆谷关、斜谷关、大散关均可达汉中,分道并进以通四川和西南各地。七、从长安往西出陇关,经秦州、渭州等地,可通吐蕃。八、从长安向西北越六盘山,出会宁关经河西走廊至西域,就是历史上有名的联系东西方的丝绸之路东段的主要线路。九、从长安向北经延州,出合岭关和芦子关,通向东西受降城的驿道。十、从长安向东北,出蒲津关至太原的驿道。从太原向东出娘子关可与从洛阳向东北去幽州的驿道相联,从太原向北出雁门关,则可与从长安通向东受降城的驿道相联。到北宋时期,首都东迁到开封,以开封为中心的北宋驿道体系中,除长安、洛阳、开封这一东西干线和由长安通往西北、西南,由开封通往东南、东北的驿道,仍

然保持其原有的地位外,原来由长安通向东南和东北、正南的驿道,都已丧失了原有的地位,甚至不再是驿道了。而由开封通往正北、西北、西南和正南,则分别开辟了几条新驿道,形成以开封为中心,通过黄河下游大平原指向东南西北全国各地的驿道网。元明清三朝则建都北京,以北京为中心的驿道体系,与隋唐、北宋各代又大不相同。唐代由长安向东北经太原通幽州的驿道恢复了,成为从北京联系西南四川、云贵、西藏,联系西北甘肃、青海、新疆广大地区的驿道干线。宋代从开封北沿太行山东麓以达辽朝南京(即今北京)的大驿道,与从开封或汲州向南经许州、潭州到广东、广西的驿道相联,成为从北京直达南海的驿道干线。而在这条干线以东,从北京经天津以达苏、杭的大运河两侧,又形成了纵贯南北的两条驿道。一条在大运河之东,由北京向东南经通州、天津、德州、济南、泰安、沂州、淮安、扬州、镇江而达苏州、杭州,再向南更经过严州、衢州、越仙霞岭而南达福州。另一条大致在运河之西,由北京向西南至涿州,折南经河间、德州、济南、东河、徐州、宿州转东南经风阳而达南京。或由风阳折向西南,经庐州到安庆,再由安庆向西南经九江、南昌、吉安、赣州,逾大庾岭而达广州。尤其是从北京向东、向东北通往辽河和黑龙江流域,向正北、向西北通往内外蒙古,向正西经山西、内蒙而达新疆,又开辟了许多或称为驿、或称为站、或称为营塘、或称为军台、或称为卡伦的一系列交通干线。以北京为中心,形成了空前完备的驿道网,标明我国古代的邮驿事业发展到最高峰。

全国驿道网布局结构方面的变化,自然要给各地区驿道的选线布局方面产生巨大的影响,使其在全国驿道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都发生重大的变化。以陕西地区为例,当秦汉隋唐建都长安时,陕西关中的长安是全国驿道网的中心,条条驿道由此向四面八方辐射。到首都东迁开封和杭州后,驿道网的构成和驿道的布局就大不一样了。原来从长安向东南经商州、邓州通往荆襄、湖广、向东北经同州、蒲州、太原,东逾太行山以达河北的驿道,都失去原来的重要地位。从长安向正南、向西南通往金州、汉中以至四川、云南的驿道,也由原来的子午道、悦骆道、褒斜道、散关道,(包括散关、凤州、褒城线和散关、凤州、兴州线)等诸道并用,都设驿馆,而变为只剩下散关、凤州、褒城线和散关、凤州、兴州线这两条了。同时,为了加强陕北和首都开封的联系,巩固西北边防,保证与西夏对抗的军事实力,经过现在的山西省、当时的河东路,先后开辟了由太原向西北,经合河关过黄河到麟州;由汾州向西北,经孟门关过黄河至绥州,沿天定河经银州而夏州;由晋州而西北,经永宁关过黄河而延州、保安军去西夏的宥州等几条新的驿道。所有这些驿道都是西北东南走向的,都是以首都开封为中心经河东路放射过来的。在关中地区的渭北平原和陕北高原南坡,也增添了渭南、富平、郃州、郿州这么一条东南西北走向的驿道,作为原有潼关、长安、奉天、邠州、泾州驿道的前卫和补充。而从河东路南部涑水盆地西端、黄河岸上的河中府,沿北洛河东北侧经同州西北至郿州再由郿州而西通庆州,也为运送军事物资而开辟了新的车道。所有这些重要的道路,都是首都移至开封之后,为适应西北的军事、政治需要而修建的。因为这时的长安,已经不是全国驿道网的中心,而变成从首都开封通往西北、西南的驿道枢纽了。论其对西北的重要性,显然要比对西南大得多。到南宋时期,关中和陕北地区都为初都北京、后迁开封的金朝所控制,只有陕南的汉中和安康地区尚在南宋的统治之下。作为四川前卫、荆襄左臂的陕南,军事政治地位极其重要。为了加强陕南与首都杭州、后方四川的联系,不仅由兴州,汉中通往成都、阆中的驿道得到认真的维修和整治;又从兴州向东南,经汉中,金州、房州到襄阳,开辟了西北东南走向的驿道,与

从襄阳经随州、安陆府、蕲州、池州而达首都杭州的驿道相联系。这样，整个陕西地区的驿道布局，由唐代到宋代，就由以长安为中心向四面八方辐射，变成除凤翔、汉中、四川一线仍保持西南东北走向外，其它均变成东西走向、甚至东南西北走向的多条驿道并列的形式了。

从古驿道的演变可知，军事对驿道的开辟有明显的作用。中国古代驿传的重要职责之一，是传递军事文报。所以在当时的政治机构中，驿传和烽燧镇戍等军事设施一样，一直是归军事机关管辖。这说明驿道与军事的密切联系。至于历史上因军事需要，包括进军和防卫的需要而开辟的道路或道路得以修治的事实，各代均有记载。例如，春秋战国时期，秦王欲伐蜀，伪为石牛粪金之计促使了蜀道的开拓。而在这以前，又有晋国的智伯欲伐仇，“遗之大钟以开道”这样十分相似的故事。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北逐匈奴，堑山堙谷千余里修直道至九原，又南征百越，设置桂林、南海等郡，开路于五岭。在西南四川、云南、贵州之间，也有五尺道的开凿。西汉武帝为征匈奴，东北方向，曾发数十万人治山西雁门一带的险道。又派张骞通西域，李广利伐大宛，卫青、霍去病绝漠征战，置驿馆修烽燧于河西新疆，开通了联系东西方的丝绸大道。西南方面经营西南夷，先后派遣唐蒙、司马相如出使，发巴蜀人民修道路，列邮驿，以通昆明、夜郎等地。清朝兴起于东北，在统一全国过程中，为平定准葛尔部叛乱、抗击沙皇俄国侵略、加强国防的需要，从首都北京向东北、正北、西北边疆，都开辟了大驿道。驿道网的建设，比之前代更为完备。如从北京向东出山海关转向东北，经沈阳、吉林通宁古塔、三姓以至黑龙江流域设有驿站。从北京向东北出古北口，经承德，内蒙到齐齐哈尔、墨尔根和瑷珲设有台站。北京向北出独石口经多伦淖尔、内外蒙古到呼伦贝尔，设有蒙古台站。从北京向西北出张家口，经内蒙古到外蒙古的库伦和恰克图，有北路军台，再西到乌里雅苏台和科布多，有西路军台。从北京向西，逾太行山，经大同、归绥、沿河套北到宁夏，或沿长城内外到宁夏，再西行经河西走廊到新疆，也设有驿站和营塘、军台。而从新疆的哈密，又有驿站、营塘、军台、卡伦分别北经镇西去科布多，或折西去乌鲁木齐、伊犁和塔城，或由哈密西经吐鲁番去乌鲁木齐，或西南折向哈拉沙尔、阿克苏、喀什噶尔和叶尔羌。这些历史事实，也都充分说明驿道的发展与军事需要有着密切的联系。

全国情况如此，具体到陕西也是一样。历史上凡是实现了全国统一的王朝和国力兴盛的时期，统治者为了巩固统治，加强国防，扩张势力范围，都注意修整道路，健全驿站制度，发展交通。就是在全国分裂割据时期，伴随着各个割据政权间不断的兼并战争，为适应军事需要，也不得不有修路置驿之举。如，三国时期，割据四川的刘焉指使张鲁占据汉中，“断绝谷道，杀害汉使”。故后来曹操讨张鲁，没走褒斜道而从散关、凤州、兴州道，破阳平关，入汉中。及刘备由四川北征汉中，定军山之战，夏侯渊败死。曹操前往救援，拔诸军出汉中，来往都是走的褒斜道，说明这期间褒斜道经过修整。其后魏蜀交兵，蜀将赵云、魏延等虽在不利形势下一次又一次烧毁栈道，阻止交通。但更有诸葛亮为进军而改善交通工具，制造木牛、流马和修复栈道的记载。尤其诸葛亮在发动攻魏的最后一战，即五丈原之战以前，曾派兵对赵云烧毁的栈道，进行认真的修整。还在斜谷之口修建邸阁，以存蓄用木牛、流马等新制运输工具送到前线的军事物资。而褒斜道这条穿越秦岭、联系关中和汉中的最短通道，也是在魏蜀战争中始见于历史记载的。三国末年，司马昭派钟会率领大军三路并进，攻取四川，钟会任命许褚的儿子许仪在前治道，并因所修道路、桥梁不合要求而斩许仪以示众。五胡十六国时期在北方建立了一个又一个割据政权的游牧民族首领，一般认为他们是耽于骑马田猎，而不措意于道路修

筑的。但实际上这时并不乏关于开山修路的记载。像割据陕北、内蒙，建立夏国的匈奴首领赫连勃勃，为经营陕甘，进军关中，就曾开辟了从国都统万（今陕西靖边县白城子）直通长安的大道，被称为圣人道。其遗迹直到明清时期还有存留，一些地方志中也有记载。其后灭亡赫连夏和北燕、北凉，统一黄河流域，由平城而迁都洛阳的北魏拓跋氏政权，与南朝发生争夺汉中和四川的战争，也对褒斜道的南段进行过大规模的修整。流传到现在的著名摩崖石刻《石门铭》，记载了北魏龙骧将军梁秦二州刺史羊祉经皇帝批准，派左校令贾三德统领一万徒众，修凿开拓回车以南，谷口以北，褒斜道南端河谷险段，以“释负担之劳，就方轨之逸”，建成“阁广四丈，路广六丈”，可以“连辎并轡而进”的宽平车道。其后北魏内乱，分为东西，汉中地区又为南朝攻取，西魏又先后派遣大将达奚武、尉迟回进攻汉中和四川。在此期间，亦曾派侍中崔猷等“凿山堙谷五百余里”，修车道以通汉中。而在南朝方面，也有关于梁将王神念改修子午道的记载。唐初，为了维护北边安全，加强河套防务，曾从首都长安向西北经邠州、庆州至灵州，东北经同州、太原至朔州，正北经坊州、鄜州至延州，并由延州西北经夏州、到黄河岸上的丰州，延州向东北经绥州、到黄河岸上的胜州等线，都辟为驿道，设有驿站。从长安向南和西南的子午道、褒斜道、悦骆道、散关褒城道、散关兴州道等，也均设馆置驿，诸道并用。安史乱后，唐王朝中央势力日弱，地方藩镇势力日强。不仅延州以北通向河套地区的驿道废弛，就是秦汉以来作为长安四川大驿道的褒斜道上的驿馆，也曾一度停罢。唐宪宗元和元年，剑南西川藩镇刘辟叛乱，唐王朝命神策大将高崇文与李元奕分别取斜谷路和骆谷路进军四川平叛。为此曾修整斜谷路，复置斜谷驿馆。元和八年，传言回鹘南下，北边突然紧张。唐王朝采纳宰相李吉甫的建议，恢复从夏州经经略军通丰州、天德军的驿道，置驿馆 11 所。使天德军将由此路乘传奏事，四日余便至京师。比绕道太原，时间提前很多。唐朝末年，河中节度使王重荣、河东节度使李克用反叛，发兵攻陷长安，唐僖宗西逃凤翔。邠宁节度使朱玫又叛攻凤翔，唐僖宗再逃汉中。山南西道节度使石君涉与朱玫勾结，“毁撤栈道，栅绝险要”。唐僖宗不得不绕小道逃难。乱事平定之后，命王建戍三泉，晋晖戍黑水，“修栈道以通往来”。据“修斜谷阁道等使”晋晖的墓志铭吹嘘，整修的结果是“如化之栈道立成”。五代时期，关中、汉中、四川地区战乱频仍，栈道更因之而时毁时修。割据四川建立前蜀政权的王建，从凤翔藩镇李茂贞手中夺取汉中后，就曾重修褒斜道的南段。后唐庄宗李存勖平定前蜀之后，“兴元、关内兵戎交番”，军运困难。明宗李嗣源继位，在兴元府修复了斜谷阁道 2800 多间，洋州重修了向南的“入蜀旧路，比官道近三十五驿”，凤州也修筑了唐仓湖田路以“通风翔馈运”，西京留守王思同还对关汉中间最短通道悦骆道进行了整修。其后在北宋进攻四川，灭亡后蜀的战争中，凤州团练使张晖也因担任缘边巡检寨梁道使，熟知附近山川险易，在战前和战争过程中组织军民开修道路有功而获得升奖。至于北宋、辽和割据宁夏及陕西、甘肃、内蒙交界地区的西夏对立时期，横跨黄河两岸，从河东路通往当时的麟州、绥州、夏州、延州等陕北军事要地，以及西夏首都兴庆府等地的道路，都曾被辟为驿道。南宋与金对立时期，南宋为了加强汉中地区与后方四川和首都杭州的联系，不仅注意金牛道路的维修。又开辟了通向荆襄的驿道。前已论及，兹不重赘。而在金朝时期，金兀术统帅大军进攻宋军吴玠坚守的军事重地仙人关时，也曾任散关、兴州道上的险段青泥岭、铁山一带凿崖开道。

以上史实，说明人们对于驿道和一般道路的需要是多方面的。当全国大统一时期，强盛的王朝需要发展交通，建立完善的交通网来加强其统治；而在战乱频仍的分裂割据时期，各